

上门核查。阿孜古丽说她向派出所警察表达质疑和抱怨，因为餐厅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。不久，警察当面向她道歉。阿孜古丽说她其实也能理解，警察是例行公事，毕竟发生了暴恐事件。

阿孜古丽还讲了个小故事。不久前她年迈的父母到北京来看她，老两口终于有机会去看看天安门，但回家时怎么也打不着车，最后还是警察帮忙拦下一辆出租车。虽然阿孜古丽向父母解释说，长安街上就是不好打车，但其实父母心底也暗知其中的缘由。返回乌鲁木齐后父母对她说，“孩子，如果你待得不顺心就回家吧”。这让阿孜古丽很心酸，但后来她想开了。走在街上的阿孜古丽觉得路人投向自己的目光比别人多，“也许他们觉得我长得漂亮吧”，她说。换种心态，一下豁然开朗。

【环球时报记者 胡锦涛】

【随 笔】

为新疆民族语言学科而发的感悟

段 晴¹

我所从事专业，涉及古代印度语言、伊朗语言，因为专业关系，对新疆、西藏地区颇为关注。最近参加了对一新疆博物馆与德国大学联合研究项目的评审，颇有感触。以下的话随感而发，借《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》与大家交流。有些问题未及求证，不当之处，还请各位谅解。

众所周知，德国的科学研究，无论理工社会学科，均走在世界相关领域前列，甚至担纲引领学科的发展。德国政府尤其加大对各种科学领域的支持力度，以保持德国科学研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。这些是政府的指导性纲领。

在实际的接触中，我们发现，德国大学的学科设置有增有减。德国的大学教育，基本上是免费的，大学只是象征性地收些许学费。但近 20 年来，德国对大学学科的设置进行了调整，一些招不上学生的学科，一些被认为是没有前途、没有未来的学科，即使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，也被无情关闭。以古典印度学为例：古典印度学是德国的传统学科，最辉煌时曾有 30 所以上的大学设立古典印度学系。但是，这门学科在近 20 年内被大幅度削减。柏林自由大学的古典印度学系，曾经为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 Franz Bopp 而设立，曾经是这所大学的招牌之一，但在几年前随着最后一任教授 Harry Falk 的退休而被关闭。这一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学科在柏林自由大学从此不复存在。弗莱堡、图宾根等著名大学的古典印度学科也被停办²。

一方面，一些传统学科被削减，另一方面，德国大学更强调发展有未来的学科，而且这一理念似乎深入到每一位在职教职员。最近接触到柏林自由大学驻京办事处的德方职员，接触到宗教学系佛教领域的一位教授，她们走访北大、走访哲学系，希望开展相关领域的合作研究。当我问及同行且颇有建树的 Falk 教授（上文提到退休的那位），表示也希望加强与古典印度学科的合作时，两位优雅的女士不约而同地告诉我，那是柏林自由大学已经被关停而且不会被重新开放的学科，柏林自由大学要发展拥有未来的学科，例如目前正在寻求合作的现当代佛教学领域等。

最近看到，新疆博物馆计划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展合作，合作研究新疆博物馆藏回鹘文本《弥勒会见记》³。参加这项研究的德方阵容，大有“未来”的味道。

¹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

² 这并非意味德国这一领域不再处于领先地位。以此学科而论，德国依然是最好的。

³ 回鹘文《弥勒会见记》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古代维吾尔语文献，属于佛教类文献。古代维吾尔人曾经信仰佛



德国哥廷根大学参加合作的4名学者中，2名是德国人。首席Laut教授，1954年出生，曾长期与中央民族大学已故突厥学教授耿世民合作。成员除了1969年出生的Wilken博士以外，另外2名则原本来自新疆，现就职于德国大学，或在德国相应部门工作。他们是：1)阿不来提·赛买提，出生在新疆阿图什，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化专业毕业，曾经在土耳其安卡拉哈吉特佩大学进修，自1999年—2003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、中亚研究系教学助理，2003—2009柏林霍尔大学突厥学教师，2009年至今，哥廷根大学聘用教师。2)艾斯玛·米尔苏勒坦，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，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毕业，2000年新疆大学社会文化系硕士毕业，2007年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，2011年参加了德国汉高(Gerda-Henkel)基金会资助的课题“民国时期南疆多种形式的法律与习俗”。自2011年至今，任职于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东亚部。

两位出生于新疆的同胞成功就职于德国大学等部门，从他们的履历其实可以品味出，德国大学在削减部分传统学科的同时，却在加强一些学科。对于外来人口就业，德国各个机构一向控制非常严格。大学的位置，更是很少聘用外国人。但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却聘用了来自中国维吾尔族学者。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，也在若干年前聘用了来自新疆的亚库普教授担任教授级研究员，以接替著名的德国著名的突厥学学者Peter Zieme。聘用来自中国维吾尔族学者担任大学的教师，一定有加强维吾尔语教学的需要。而这样的加强，反映了德国大学对“拥有未来”之学科的构想。

看到新疆博物馆提议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开展研究，我的第一反应，即中方应派出梯队人才参加合作。因为根据一般情形，德国方面选择与博物馆等合作，主要看重我们的独特馆藏，看重中国才拥有的原始资料，通过对原始资料的研究，增强学科的实力，达到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的意义。而中国一方愿意与国外合作，更多是因为国内相关学科较弱，可利用原始资料，通过与国外合作，达到培养人才，加强学科建设之目的。

但是我发现，目前对回鹘文的研究以及突厥学科，在中国其实仅局限在中央民族大学。而北京大学等中国所谓一流大学，根本没有这样的学科。北京大学不仅现阶段没有维吾尔族教师，没有维吾尔语教学，而且未来也很难设立。目前状况：北京大学将汉语以外的语言教学，基本上归入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。外国语学院的建制，使我们处于尴尬的状态。即使因为学科的需要，应该在北大开设维吾尔语教学，例如历史系边疆史、社会学系、宗教学系，其实皆需要安排维吾尔语课程。但是在北大，这样的课程是否应交给外国语学院完成呢？至少在德国，我没见过这么“排外”的建制，即把非本国语言类学科，统统纳入“外国语学院”。

这里应当说，如北大这样的国内一流大学，实际上影响着中国社会所倡导的文化倾向，主宰着中国社会的文化潮流，在中国具有学科引领的功能。北京大学、人民大学加大对国学的投入，而根本不设突厥学、现当代维吾尔语文学课程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在社会大众层面，已将突厥学、维吾尔文学等排斥入弱势。这里不妨做个调查，中国的知识分子，饱读诗书的学者，有几个人知道维吾尔语的作家，了解当代维吾尔语诗人？据了解，北京正在兴建超大的国学殿堂，是否在这样的殿堂之侧，也能建立起类似“天山阿尔泰”之类的研究中心呢？仅以新疆维吾尔族而论，它的人口已超过千万人。

在中央民族大学之外建立针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高层次的研究中心，在北大这样的大学中设立突厥学的学科，实际上更有助于国家的统一，有助于凝聚新疆地区各族人民。唯有充分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，让它的人民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，人家才会有发自内心的认同感。建立这样的中心，更有利于提升普通民众对生活在中国境内不同文明的了解。实际上，汉族文化与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族文化之间，存在着多层次的不同，以维吾尔族为例的新疆各民族文化应得到充分的尊

教。宋元两代是佛教在回鹘人中鼎盛时期。在信仰佛教时期，回鹘人采用了以粟特文为基础而创制的回鹘文，以回鹘文取代了漠北时期使用的古代突厥文。佛教在新疆最后被伊斯兰教所代替，是在公元14、15世纪。伊斯兰教传入，回鹘文逐渐废弃不用，而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，察合台文诞生。参阅耿世民：《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〈弥勒会见记〉哈密写本研究》，载于《文史》第十二辑，1981年，第211—226页。

重。而这样的尊重不应仅仅存在于干部的口中，而应有高层次的推动，应得到高层次的研究、发扬。

这里应举出藏学中心这样的成功案例。建立于北京的藏学中心，最初大约是出于与达赖集团政治斗争的需要。虽然至今藏学中心的学术研究参差不齐，科研成果尚有不尽人意之处。但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，藏学中心作为高层次学术中心的存在，推动了国内藏学研究的进步。尤其是，当突发事件出现，藏学中心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。2008年314事件之后，藏学中心立即派出了由学者担纲的调查小组，深入藏区寺院，为政府制定反分裂政策提供了依据。青藏铁路修成，一组围绕观察分析藏区生活结构变化的课题随即诞生。围绕藏学中心，近年来在北京还建成了西藏博物馆等，藏学中心也与国际学界开展了合作，例如与奥地利、日本开展的西藏贝叶经研究工作等¹。这些成绩不但在国际上提升了中国好形象，而且真正显示了中国现当代对不同文明的尊重，令国际学界知晓，藏学研究不仅在达姆萨拉（达赖所在地），而且北京也有。尤为重要的是，中国藏研中心的存在，无形中增加了中国老百姓对西藏文化的了解。北京内地，学习藏语的人远多于学习维吾尔语的。我去过西藏和新疆。拿西藏的安居房，与南疆的安居房相比较，西藏的安居房，似乎适应当地的民居，与当地文化基本协调。而南疆的安居房不类不伦。这其中其实反映了藏学相对较强，而对天山阿尔泰各民族的研究远远滞后。

北大梵巴专业，虽然属于外语学院，但为了真正使我们的学科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，出于专业学科建设的需要，我们特别引进了藏族学者一名。这名优秀的藏族学者，在北大开出了多种藏语课程（目前限制在古藏文），改写了北大无藏语课程的历史。开课以来，藏语课程在校内外广受欢迎。

借此《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》，我呼吁在北京建立天山阿尔泰学研究中心。这样的中心耸立在北京，将有利于突厥学研究，促进对不同文明的了解，增强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。

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
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
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

本期责任编辑：马戎、王娟
邮编：100871
电子邮件：marong@pku.edu.cn

¹ 西藏收藏有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古代梵文贝叶经。这些贝叶经的照片其实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为外国学界所掌握。中国藏研中心通过与外国相关学术领域合作，实际上有“回收”的意义。毕业于北大梵巴专业的罗鸿受聘于藏研中心，参加了相关课题，在国际上获得赞誉，也是对北大梵巴专业所培养人才的肯定。

